

一种关注

流淌了八小时之后,静静的顿河留下了什么?

——评日前在沪上演的俄罗斯话剧《静静的顿河》

吴小钧



话剧《静静的顿河》剧照,上汽·上海文化广场供图

肖洛霍夫在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中,引用过哥萨克古歌中的一句歌词:“静静的顿河,你的流水为什么这么浑?”

看完日前在沪上演的、时长达八小时的同名俄罗斯话剧之后,我觉得这句歌词可以非常贴切地表达我对其复杂的观感。

原著的主人公是一群生活在顿河沿岸的草原带上的鞑靼村的哥萨克(生活在东欧大草原上的游牧族群),他们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和选择既是一个充满了血与泪、毁灭和死亡的过程,同时也是人性萌发和重生的过程。在俄苏文学史上,同样品质的巨著还包括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但在笔者看来,《静静的顿河》更有诗意和地域特色。

话剧《静静的顿河》的导演格里高利·科兹洛夫早年毕业于列宁格勒造船学院,曾当过工程师,但志不在此,后来又曾就读于列宁格勒国立戏剧、音乐和电影学院。他在多家剧院执导的同时,也在戏剧学院任教。现在在这家创建于2010年的圣彼得堡马斯特卡雅剧院的班底,就是他在戏剧学院指导的表演和导演班的学生,他则是剧院的艺术总监。《静静的顿河》是他在戏剧学院带班时,指导学生根据原著所做的课堂教学小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现在的话剧。笔者此前曾观看过圣彼得堡小剧院根据费·阿勃拉莫夫的长篇小说《普里亚斯林一家》改编、同样是八小时时长的《兄弟姐妹》,和莫斯科艺术剧院附属高等戏剧学校根据陀斯妥耶夫斯基同名小说改编的《卡拉马佐夫兄弟》,

它们的诞生均出于这样的方式,这也决定了这一类的舞台作品往往具有“群像化”和“片段化”的特点。

基于此,笔者便以两个标杆为参照来观看《静静的顿河》,一是文学原著,二是以同类方式打造的《兄弟姐妹》和《卡拉马佐夫兄弟》。

给我的直感,八小时的演出有不少闪光之处;譬如舞台前部左右各置一个体现了游牧社群的哥萨克人家庭生活特色的马槽,根据剧情的需要分别衍化为桌、床,转眼间随角色的形体语言和大声吆喝又成了疾驰的马车;又譬如以演员人手一方披巾上下翻舞来象征在草原上挥舞长柄刀割草,同时他们有力地甩动披巾犹如战场上厮杀的马刀;再譬如舞台深处的正中有时会呈现一道

门,既能窥视男女的床第之欢,又象征着生死阴阳之界。如若把该剧作为戏剧学院的教学演出,其水准是值得推崇的;但如若作为一个来自素以“文学为中心”的国度的专业剧院,该剧显然还存在提升的空间和提炼的可能。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我以为,关键在于“文学”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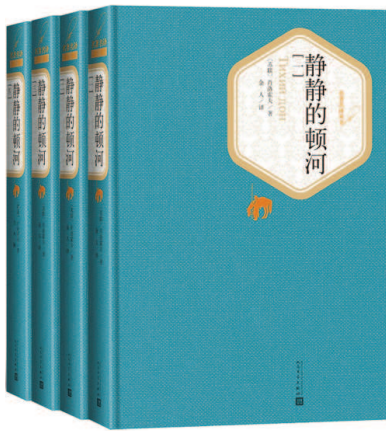
这里的文学既指该剧对文学原著的呈现,也包含了舞台演出合本的品质要求。导演格里高利此前在接受采访时曾透露,这个剧是从学生做小品开始,把所有的小品集中起来后发现时长达到了16个小时,最终他们改为八小时30分钟。同是改编自文学名著,同是采用这种创作法,为何《兄弟姐妹》和《卡拉马佐夫兄弟》获得了成功呢?

笔者以为,话剧《静静的顿河》在对原著的改编上有三个问题值得推敲——

其一,结构的合理性值得商榷。为了有头有尾地表现格里高利的人生命运,全剧分四幕,而带给笔者的观感是前半部显拖沓,后半部则显局促,这在首尾两幕中尤为明显:第一幕主要是呈现格里高利与邻居司提潘之妻阿克西妮娅的情感纠葛,潘杰列伊为了拆散他们,将门当户对的娜塔莉娅给儿子娶进门,但夫妻同床异梦。这些情节来自只占原著篇幅7%的第一卷,同时导演还在第一幕里加入了大量表现哥萨克风俗的歌舞及生活场景,如洗澡时用桦树条抽身、打草等,使进程极慢,一度像是在旅游景点看景观剧。反观第四幕,

它与第一幕的演出时间相同,都是110分钟,而它所表达的内容是占原著篇幅近30%的第七、八两卷,而这两卷构成了原著中最为饱满精彩的部分,因战争导致的哥萨克人相互残杀,格里高利的亲人相继死亡;父亲因患伤寒病客死他乡、获哥萨克顿河军死亡家属勋章的兄嫂达丽亚溺水自尽、妻子娜塔莉娅出于怨恨堕胎致死、母亲因极度思念儿子郁郁身亡、情人阿克西妮娅在随格里高利逃命途中被流弹打死……这些场面非常感人,一个个接踵而至的悲剧将作品推向高潮。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竟在舞台上没有充分展现,有的甚至只是一笔略过。这方面,《兄弟姐妹》显然是高出一筹,该剧只选取了四部中的第二、三部和第一部的少量情节进行改编。

其二,史诗性与抒情性间的失衡。要知道,史诗性与抒情性是原著最主要的艺术特色。借两个既对立又呼应的空间:战场和乡村,原著小说把对于战争的全景式的恢弘叙事与对于哥萨克人日常生活及内心情感的细腻描写交织在一起。两者之间既不能割裂,也不能偏废其中的一方。但是,话剧却使“史诗性”的一条腿细,“抒情性”的一条腿粗,这也是许多评论所诟病的焦点。其表现就是将情节叙述的重心过于倾倒在格里高利与阿克西妮娅、娜塔莉娅的这一组人物关系及情感纠葛上面,但是弱化了原著中战争与政治的部分,从而使剧作失去了应有的历史厚重感和哲理性。这在演出的前半部分特别突出。史诗与抒情间的失衡也体现在舞台设计上,写实且近似于封闭式的布景大部分时间是呈现“天花板”下的内容,投射于天幕的视频缺乏整体构思,这么做导致



《静静的顿河》
肖洛霍夫 著
金人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舞台向金戈铁马的战场、向辽阔无垠的俄乌大草原、向日夜流淌的顿河水延伸的空间非常狭窄,这也是笔者所始料未及的。要知道,在俄罗斯、在哥萨克,草原具有“养育者”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是“母亲”的化身;而顿河则是“父亲”的化身。曾有学者指出,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中“那种既冷静又抒情的描写,显然是受契诃夫影响的结果”,如果我们有兴趣阅读原著的话,很容易发现这一点。但现在同样的情节出现在舞台上,我们则很难感受到契诃夫文学手法对于肖洛霍夫的支持。

其三,关于人道主义精神开掘稍显乏力。人道主义始终是俄苏文学高扬的一面旗帜。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里,人道主义体现在作者塑造了

一个有自己的快乐和哀愁、内心深处埋藏着许多幻想、希冀、忧思和痛苦的普加乔夫形象。而在《静静的顿河》中,肖洛霍夫的人道主义精神不仅表现为他对小人物的热爱,还表现在作家敢于正视那些苦难和死亡的时刻,并以那些苦难和死亡的时刻来揭示格里高利们的悲剧所在。而肖洛霍夫为人物所赋予的人性的光芒,在剧中几无表现。在还没有观看该剧时,我非常希望小说第三卷第十一章的内容能够在舞台上得以呈现:格里高利在执行任务时发现一个哥萨克士兵的尸体和他的日记,里面记载着他与医科二年级学生、来自顿河的商人的女儿莫霍娃的相识、相恋、分手的过程,为忘掉失恋带来的痛苦,哥萨克士兵决定走上战场;他看见第一个被打死的德国兵,同时也是第一次朝德国兵开枪……而话剧则是在第二幕让我们看到:娜塔莉娅的兄弟米特里追求莫霍娃,约她出来钓鱼并强暴了她,事后他想弥补就去求婚,遭到拒绝。两者相比,人道主义的内涵孰轻孰重很是分明。

最后,我还是要感谢圣彼得堡马斯特卡雅剧院为中国观众送来《静静的顿河》,这是这部文学名著在当下的一次重生。通过它的演出,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同行对戏剧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以文学为中心,特别是以经典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名著为中心,这也是俄罗斯戏剧教学、演出和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这多少解释了为什么俄罗斯戏剧能够在“黄金”“白银”的十九世纪大踏步地走向世界戏剧舞台的前沿并延续至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观不止

唐宋不少文献都记载了一件大同小异的趣事:初至京城的白居易去拜谒前辈诗人顾况,没想到对方拿他的名字开起了玩笑:“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王定保《唐摭言》)。小说家言虽然并不可信,却折射出唐代人对长安生活的向往和焦虑。而白居易数十年间在长安城中迁居的真实经历,也确实令人惊叹颇为不易。

唐代长安城通过纵横交错的街道将整座城市规划成一百多个大小相近的坊里,正如白居易所描绘的那样,“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登观音台望城》),星罗棋布的网格状结构显得井然有序。尽管在安史之乱后略显凋敝,但当白居易来到长安时,依旧是一派“轩车歌吹喧都邑”(《长安早春旅怀》)的繁盛景象。可为了准备即将到来的科举考试,“喧喧车骑帝王州,羸病无心逐胜游”(《长安正月十五日》),他不免有些忐忑难安,无心赏玩眼前的景致。

待及第后,白居易任秘书省校书郎,就此开始了在长安的生活。他先在东北角的常乐坊找到一处居所,尽管频圯破落,仅有“茅屋四五间”,但“窗前有竹阮,门外有酒沽”(《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仍令他心满意足。闲暇时他也四处游览,当看到冬去春来“冰销泉脉动,雪尽草芽生”(《早春游曲江》)的情景,恐怕也有苦尽甘来的深切感受。有一次他还跑到西北角的辅兴坊,品尝从西域流传来的胡饼。他后来在别处又见到类似的胡饼,立即寄了几个给朋友,并以诗代柬调侃道:“寄与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寄胡饼与杨万州》)。常乐坊有一处古迹,相传是汉代大儒董仲舒的陵

墓,行人至此都要下马致敬,故称作“下马陵”,又以讹传讹成了“虾蟆陵”,他应该也到此瞻仰凭吊过。多年后他被贬至江州,偶遇潦倒沦落的琵琶女,攀谈中听到对方介绍身世,“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顿时勾起对往昔生活的追忆,在泪湿青衫之际不由喟叹“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琵琶行》)。

几年后,白居易罢去校书郎,移居到长安城中部偏东的永崇坊华阳观。“轩车不到处,满地槐花秋”(《永崇里观居》),和临近兴庆宫因而更为繁华热闹的常乐坊相较,这里显得格外幽静。他与好友元稹同居于此,闭门苦读,切磋砥砺,准备参加另一科考试。有时则邀请友人前来欢聚,“华阳观里仙桃发,把酒看花心自知”(《华阳观桃花时招李六拾遗饮》,“华阳洞里秋坛上,今夜清光此处多”(《华阳观中八月十五日夜招友玩月》)。偶尔也会外出游赏,有一天还兴致勃勃跑到远在大宁坊的河中节度使浑瑊家去欣赏盛放的牡丹,并击节称赞“香胜烧兰红胜霞,城中最数令公家”(《看浑家牡丹花戏赠李二十》)。不过数年后他再次提及京城赏玩牡丹的风气,却痛心疾首地斥责道:“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秦中吟·买花》),对先前的耽迷痴狂想必也深有悔意。

白居易再次登第后曾暂时离开长安任职,不久后回来,一度寄居在友人杨汝士、杨虞卿兄弟位于靖恭坊的私宅中。“春初携手春深散,无日花间不醉狂”(《醉中留别杨六兄弟》),足见宾主双方言谈投契。不过等到“杨氏弟兄俱醉卧”后,他却“披衣独起下高斋”,甚至“夜深不语中庭立”(《宿杨家》),似乎心事重重。原来早过而立之年的他尚未婚娶,而杨氏兄弟正好有个从妹待字闺中。当他在月下低徊彷徨时,或许正斟酌着如何缔结这桩姻缘。所幸不久后便如愿以偿,在送给新婚妻子的诗中他深情款款地写道:“庶保贫与素,偕老同欣欣”(《赠内》),两人的情投意合令人称羨。

为了表达对妻子的爱意,白居易在邻近靖恭坊的新昌坊又赁得一处居所。此时他担任左拾遗、翰林学士,日常公务琐碎繁杂。他对此时有慨叹,“身贱每惊随内宴,才微常愧草天书。晚松寒竹近新昌第,取居密近门多闭”(《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长句之赠兼简张大贾二十四先辈昆季》)。尤其是冬天要赶去处理公务,“将赴银台门,始出新昌里”,“十里向北行,寒风吹破耳”(《早朝贺雪寄陈山人》),路途遥远艰难。不久后女儿出生,“断非达者怀,未免俗情怜。从此累身外,徒云慰目前”(《金銮寺畔日》),让年将不惑的他觉得再怎么辛劳都心甘情愿。闲暇时他和居住在两条街外靖安坊的元稹过从甚密,“微之宅中有辛夷两树,常此与微之游息其下”(《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元稹也提到白居易曾邀人到家中“说一枝花话”(《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即讲说长安倡女“一枝花”李娃的故事以供消遣娱乐。稍后元稹赋有《李娃行》,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又写了《李娃传》,都和这个故事有关。在居所前有一座青龙寺,“闲有老僧立,静无凡客过”(《青龙寺早夏》),他也常去参观拜访。日本僧人空海、圆仁、圆珍等先后入唐,都曾在此居住求法,并将不少汉文典籍带回日本。白居易的诗作后来远播东瀛并深受欢迎,和这些遣唐僧侣也大有关系。

数年后,白居易又举家迁居至新昌坊西邻的宣平坊,不久其母陈氏在家中病逝。白氏兄弟从小靠母亲辛勤抚育,“昼夜教导,恂恂善诱,未尝以一呵一杖加之”(《襄州别驾府君事状》)。母亲的遽然辞世令他极为悲恸,为了丁忧便离开长安,暂时退居乡里。

守丧期满后,白居易回到长安,在中部偏南的昭国坊住下。此时他任太子左赞善大夫,职务较为清闲。他不可避免

杨焄

此自嘲,“勿嫌坊曲远,近即多牵役。勿嫌禄俸薄,厚即多忧责”(《昭国闲居》)。闲散清静的生活倒是加深了他对诗人韦应物的偏爱,表彰韦诗“高雅闲澹,自成一家之体”,对其在世时“人亦未甚爱重”(《与元九书》)感到忿忿不平。韦应物的故居恰在昭国坊中,比邻而居的他必定感到非常亲切。老友元稹经常会来探望他,有一次还结伴出游。两人在马上交流诗作,“自皇子陂归昭国里第,迭吟递唱,不绝声者二十余里”(《与元九书》),把同行的朋友都抛在了后边。另一位朋友张籍也“远从延康里,来访曲江滨”(《酬张十八访宿见赠》),带给他莫大的慰藉。有一次外出他还遇到相识多年的李绅,“榆荚抛钱柳展眉,两人并马语行迟”(《靖安北陌赠李二十》),回忆起往事有说不尽的话。白、元、张、李等都擅长创作具有讽喻意味的新题乐府诗,这和他们多年切磋交流、声气相通息息相关。

由于在政坛上遭到排挤,白居易被贬官外放,数年后才被召回。“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卜居》),多年来的颠沛蹭蹬,使他感到身心俱疲,厌倦了赁屋暂居的生活,终于在曾经居住过的新昌坊购置了一所住宅。“地偏坊

远巷仍斜,最近东头是白家”(《自题新昌居止因招杨郎中小饮》),可知僻处一隅而位置不佳;“檐漏移倾瓦,梁欹换蠹椽”(《新昌新居书事四十韵因寄元郎中张博士》),显然破败已久而亟待整修;“院窄难栽竹,墙高不见山”,看来也并不宽敞(《题新昌所居》)。但对他而言,“移入新居便泰然”(《题新居寄元八》),还是对此满怀眷眷深情。可惜好景不长,由于国事日艰,他主动要求外任,相继在杭州、洛阳、苏州等地任职,偶尔才回到长安。不过新昌坊的宅院并未闲置,有位朋友崔玄亮在长安时就暂居于此,而白居易当时正在洛阳,也寄居在崔氏家中,“君向我斋眠,我在君亭宿”(《闻崔十八宿于新昌弊宅时予亦宿崔家依仁新亭一宵偶同两兴暗合因而成咏聊以写怀》),两人等于相互交换而互不亏欠。

白居易在长安城断断续续居住了二三十年,尽管最终并未终老于斯,但在多年四处迁居的过程中,这里的街衢坊里却见证了他的入仕、升迁和贬黜,记录了他的焦躁、奋斗和无奈,更烙印了他的友情、爱情和亲情,困顿不易的生活最终还是留给他难以磨灭而耐人回味的记忆。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